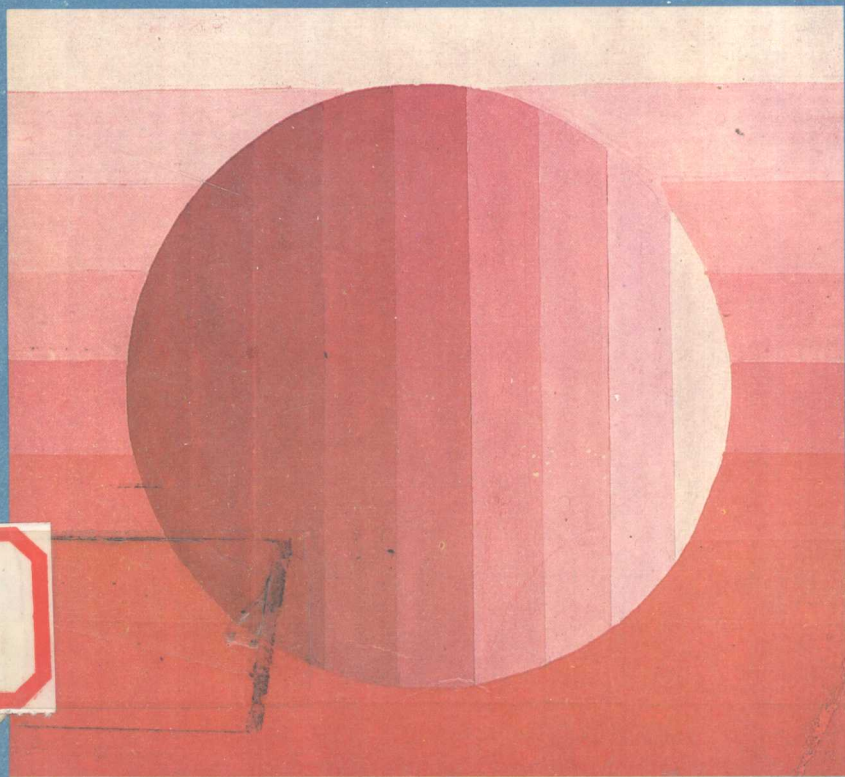


中华一统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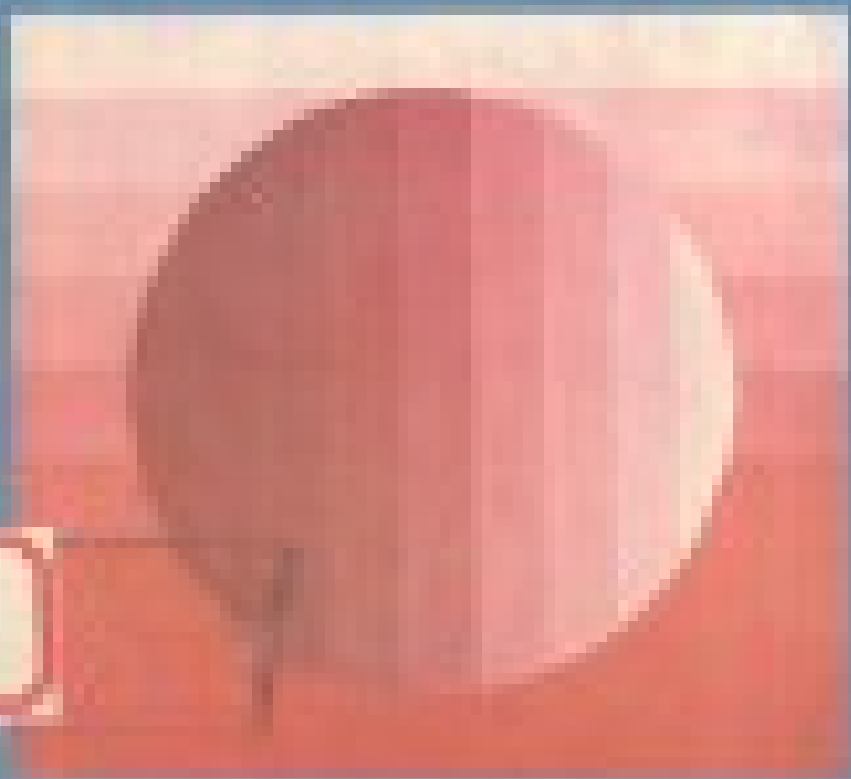
杨向奎 / 著

大一统 与儒家思想



第一輯 總論

——大一統 與儒家思想



Bz
7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杨向奎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杨向奎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6.625 - 153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5057—0190—8/K·35定价 3.00元

序 言

十年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佟冬同志邀我去该院讲《公羊春秋》。他说，吴承仕先生曾经说过，清末，满朝满野讲《公羊》，因而促进了变法维新运动，当时虽然变法不成，但《公羊》的精神未泯，所以我答应了邀请而说《公羊》大一统义。当时在座者有张璇如、蒋秀松、郭建文等同志，今春，璇如等三同志来访，重谈《公羊》，约我写《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应之，遂有此作。

大一统义倡自《公羊》，汉末何休发杨光大之，千百年来此义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间之凝聚力，都是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始终应当一统。魏晋以后，政权分崩，实不一统，但任何一族之当道者，都以一统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负。十六国时代，后赵石勒本羯人，当他意欲移都洛阳而饗酒，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萃，超绝魏祖，自三王以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朕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非拟乎！”（《晋书载记第四石勒。》）石勒属于当时之少数民族，臣下乃比之于华夏轩辕，而自处于二刘之间逐鹿中原以统一天下。无任何氏族隔阂，都是大一统之负荷者。后来宋人欧阳修、朱熹等先哲，又

倡正统说，以补大一统说之不足。

近来陈桥驿教授在《酈道元生平考》一文中也曾经指出，在“《水经注》这部巨著中，却相当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观点，从全书来看，他最主要的思想，即是前已述及的南北统一，恢复一个版图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愿望。”这说明了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变作无比的精神力量。陈教授又曾经说，“在《水经注》以前的一切地理著作中描写祖国各地的自然风景的，实在凤毛麟角，但酈道元却在这方面如此殚精竭力，逾格重视，这只能说明他如何地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一个生来就从未见到过统一祖国的人，却要从事历史上一个伟大王朝的疆域作为他的写作范围，这也只能说明他是如何向往着一个统一的祖国。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国家分裂，山河破碎，战争频仍，人民流离的时代里，但酈道元却能写出这样一部把当时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融合成一体巨著，而又以如此美好的描述，歌颂祖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由此可以说明，《水经注》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著作，而酈道元则是一位值得崇敬的爱国主义者。”（《酈道元生平考》见《地理学报》43卷3期）

陈桥驿教授称赞酈道元是一位值得崇敬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位祖国统一的向往者。我们钦佩桥驿教授的卓识，同时也认识到，即使在中国分崩离析的时代，无论朝野，这统一的思想始终浸润在人们的心间。

杨向奎

1988年12月5日于北京

中华一统丛书

顾问：

白寿彝	楚 庄	谭其骧	杨向奎
王钟翰	杨志玖	伍 杰	许天鸣
张起良	蔡美彪	李 侃	刘先照
王承礼			

主编：张璇如

副主编：吴井田 郭建文 蒋秀松
周光培

编委：

干志耿	尤 中	田居俭	田继周
肖 黎	吴井田	陈连开	陈铁健
杨建新	周 雷	周光培	郭建文
张中澍	张璇如	富育光	蒋秀松
瞿林东			

目 录

- 一 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1
- 二 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20
- 三 公羊学派之形成与大一统思想43
- 四 汉武帝之大一统与董仲舒的对策56
- 五 司马迁与公羊学80
- 六 何休对于公羊学的总结96
- 七 宋儒之“春秋”学110
- 八 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147
- 九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185
- 十 历史的回顾199

一 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

——兼论“炎黄”、“华夏”两实体之形成

“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更占重要地位。“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人们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它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这“华夏”与“中国”不能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强大的征服力量，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这种境界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而没有种族歧视及阶级差别，是谓“大同”。当然这种升华的概念是逐渐形成的。夏商时代，文献不足，我们自宗周说起，宗周人自称为“夏”比如《尚书·君奭》：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夏”即三代“夏商周”之夏，周自称为夏，“诸夏”即属于相同文化类型的国家。这些国家统一于周天子而构成“天下”。天下有四国多方，这多方不必属于华夏国家，如宗周初年，对殷商之与国即称之为“四国多方”，《周书·多方》有：

周公曰，王君曰，猷告尔四国多方。

告诉他们如果臣服于周，尚可以保留土地人民否则将“致天之罚”。我们因此看出宗周一统是有层次的：四方、诸夏与中国。中国即王都所在，乃天下之中心。因为有不同层次，后来遂有“五服”制的产生。《诗·大雅·民劳》：

民亦劳止，讫可小康，惠比中国，以绥四方。

使中国与四方并列，中国即王都与诸夏国，而四方则包括有商及东夷及原来宗周之同盟国。周灭商后，疆域扩大，已经是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因而，当时人们的思想中遂有：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即“天一统”思想之初步形成。

统一，统一于华夏，“华夏”本身也不是单一的民族集团，而是多民族的复合体。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指出，华夏集团“是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把其他的两集团几乎全掩蔽下去。此部族中又分出于两个大亚族，一个叫做炎帝，一个叫做黄帝。”

（原书第40页）华夏族诚然是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的集团，可以做为中国全族的代表，但不能说华夏族仅由炎、黄两族所构成，它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复合体，炎、黄、夏、周外，东夷集团，尤其是虞与殷商，在构成华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虞、夏、商、周四代构成了华夏族，孕育着灿烂的华夏文明。虞殷代表了东夷集团，以鸟作图腾，夏周代表了夏族集团，以龙蛇作图腾。但周代实际承袭了夷夏两系文明，孔子曾经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广义的“礼”，泛指社会文明，这是自古至今最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损”是去掉，“益”是增加，对待传统有损有益，也就是批判地继承发展，因此才出现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良好局面。“从周”是法后王，这为后来荀子之“法后王”及公羊学派之“张三世”的理论建立下了基础。夷、夏两系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系统，他们彼此交往，互相渗透，于是逐渐融合一体。夏代初期少康以前一段动乱的历史，即夷夏交争而互相渗透以至融合的历史。夷、夏之争，在当时说，已经不是异族间互相侵略，罗泌在《路史》中就曾以羿、浞之乱比之于安史之乱，后羿、寒浞实在是夏之叛臣；虽然傅斯年先生反对这种说法而认为夷羿是“敌国之君”。（见《夷夏东西说》）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过程，知道当时夷夏之间的关系本来密切。史实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襄公四年有：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钜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夫人故也。

靡是夏遗臣而臣于后羿者，虽臣于二代而不以为忤，终复夏政，说明当时夷夏已少民族隔阂，而后来之《虞箴》有云：“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同上）《虞箴》要夷羿而恢于夏家，是以夷夏为一体。又哀公元年《传》记此事有：“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郢，灭夏后相。后缙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

正，……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抚其官职，……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虞夏两氏之族外婚，而虞属东夷，是夷夏两族在夏代已融为一体。所以我们说，在华夏族及华夏文明之形成过程中，东夷与夏周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夏周文化不过是华夏文化之一支，田昌五先生的意思是可取的：“从部落王国到夏朝建立也是华夏族的形成过程，而夏文化则为华夏文化的一支，并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文化。”（见《古代社会形态析论》第202页）夏代文化不能代表整个华夏文化，因为其中融合了虞股东夷系统的文化内容。这在考古发掘上看，到了“文化叠压关系”中也可以得到说明。上引田氏著作于此指出：“这种联合和兼并的过程在考古文化中是有反映的。明显的如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和大汶口文化的氏族部落，后期有在中原地区交错而处的现象。交错而处必然要发生斗争和联合，后来在这种斗争和联合中形成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同上）虽然此所谓“形成了河南龙山文化”的论断，是否即夷夏两族交融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作为民族融合而反映出文化之推陈出新，因而有考古上之反映，是没有疑问的。华夏民族文化之融合，自虞夏开端，至宗周而成熟，“郁郁乎文哉”之周文明，实在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战国而后，在中国范围内新民族崛起，于是重新组合，而有汉族及汉文明。民族之融合，不断发展，代表本民族之文明亦不断在发展中，遂有中华民族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

华夏文明，在当时世界上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人民，它是一种向心力，回归的力量，它是统一中国的凝集力，因为它不是狭隘的民族意识，也不是并吞一切的大民族意

识，它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它是一种标准，一种水平，这标准水平用以衡量一统中国的各族，达标者为中国为华夏，落伍者为夷狄、为野蛮；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这是圣洁的辞汇，华夏，据此内容，遂有公羊学派之“大一统”。

我们说华夏文明是夷夏文明之融合体，其实即以夏族论，它也是多民族的复合。在部族时代，夏族实行族外婚，因而有姬、姜两氏，而姬、姜两氏之始祖为黄帝、炎帝。黄帝是夏、周始祖，《国语·晋语》说黄帝、炎帝同出少典氏，而《史记·五帝本纪》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兴，……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及岱宗；西至于空同，……，南至于江；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

《史记》开始于五帝，是具有卓识的，这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期，黄帝曾与蚩尤争，与炎帝争。黄帝、炎帝实为华夏族一支中之始祖。我们从《五帝本纪》的记叙中，追寻黄帝的足迹，他东至海，西至空同，南至江，北逐荤鬻；虽邑于涿鹿而“迁徙往来无常处”。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黄帝活动的中心：——是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正义》以为阪泉在今河北保定境；二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史记集解》以为涿鹿在今河北宣化保安境内；三是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史记正义》以为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与阪泉邻。那么黄帝活动中心在今北京及河北保定一带地区。但据《国语·晋语》云“黄帝以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所谓以某水成即生长于某水域，而姬水、姜水均不在今河北、北京一带，今陕西尚可以找到以上两水。徐旭生先生说：“比较可靠的是姜水所在，《水经注》渭水条下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岐水在岐山南面，当在今陕西岐山县城东面，就是地图上西出岐山，东过武功，折南流入武功的小水。此水南面隔着渭水，就离秦岭不远。……姜水与古华山很近，炎帝的传说或可以传播到山的南面。皇甫谧所说的‘炎帝母游华阳’来源颇古。……现在宝鸡县城南门外就临着渭水，过渭水南一、二里，在黄土原边上有一村，叫做姜城堡，堡西有一小水，从秦岭中流出，叫做清姜河。……这一个姜城堡，《宝鸡县志》说它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姜氏城。……姜城堡与姜氏城虽有两个字的相同，一定不能是一个地方。虽然如此，姜城堡附近却有很好的彩陶遗址，在我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就有人居住。……并且，周弃的母亲姜原（或作姜嫄）明白为姜姓的女儿。周弃所居的郃就在今武功县境内，西离岐山也不过几十里。……姜姓其他的一个神话中所说的磻溪水也在这一带。《水经注》渭水条下说‘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兹中有泉谓之兹泉。……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者也。其投竿踦饵，两郃遗迹犹存，是有磻溪之称也”。……磻溪的名字应当不是妄传。这条水在现在宝鸡县城东四、五十里处的渭水南岸，为一小溪，北流入渭水。……这以上所述文献内的材料，考古方面的材料，民间传说的材料，似乎完全符合，足以证明炎帝氏族的发展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1—42页）

以上徐旭生先生对于姜水及有关地区的考证颇细致，用以

说明姜氏族的发祥地。但姜、羌本为一体，他们的来源去路遍及黄河上下游，山东境内先秦时代多姜姓古国，而太公望于封齐前，在东方的传说并不比西方少。而姜为四岳后，四岳乃其发祥圣地。那么说，炎帝姜姓氏族发祥在今陕西渭水上游问题颇多。我们低估了古人的活动力量，他们尚非农业，迁徙无常，发祥地云云，是很难确定的，但姜氏曾活动于姜水流域是无问题的，一如姬氏之曾活动于姬水流域。但姬水所在却不易追寻，徐旭生先生就曾经说：不知道是现在的哪一条水。（同上）但徐先生也曾指出，姬姓的周弃就住在郃，姬姓最初祖先，黄帝的坟墓相传在桥山。桥山，近代的书全说它在今黄陵县（旧中部县）境内，实则北宋以前记载全说它在汉阳周县境，阳周县在今子长县境，在黄陵县北偏东数百里。又黄帝的传说同空同很有关系。《新唐书·地理志》原州平高县下有崆峒山，当即此地。平高在今甘肃镇原县境内，离陕西界不远。看古代关于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它与发祥在陕西西部偏南的炎帝的居住地相距并不很远。

徐旭生先生治学谨严，不作泛滥的推断，但谓黄帝氏族发祥于陕西北部的说法，与炎帝氏族发祥于陕西西部偏南的说法，同样有问题，不能以活动过的地区当作发祥地。上面已经说过，黄帝是华夏族的一支祖先，他的故事遍中国，我们曾经引用《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说明黄帝的活动中心在北京保定一带，而他们是“迁徙无常”的。研究中国古代史，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抛弃《史记》记载于不顾，一来，司马迁，他比我们早生两千多年，接近上古，二来，他是有眼光而谨严的史学家。以此关于黄帝与姬周的发祥问题须作进一步推敲。

先论姬水，徐旭生先生说不知其所在。我也曾到周原作过

调查，无论文献或考古，在当地都设有姬水的名称，但姬水必定是周原一水，因姜水在，与之相伴的姬水就不会失踪。现在《诗经》如《大雅》与《周颂》，是西周时代对先人及当时的歌颂与怀念，虽有神话夹杂其间，那是传统的《史诗》，有夸张而无编造，我们可以从中觅得姬水踪迹，《诗·大雅·緜》有：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赳赳，董荼如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

又《周颂·潜》：

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鱣有鲔，鲙鱉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外在《小雅·吉日》中也有“漆沮之从，天子之所”。《大雅》、《周颂》都是西周诗歌，从《大雅·緜》中可以看出，周人最初，土居沮漆，自公亶父开始，自西沿水浒而至岐下。他们长期没有离开这条水，这条水养育了他们。所以《周颂·沮》说“猗与漆沮，潜有多鱼！”美哉漆山而多鱼。《小雅》则进一步说“漆沮之从，天子之所”，这是定鼎的地方，真正是周人的发祥所在。我们以为漆沮水即姬水，漆、姬古韵部虽远，但声纽接近，姬属见纽，漆属溪纽，可以通假。“漆沮”实即姬之缓言，急读为姬周人姬姓，沿漆沮为生，即以漆沮为“本生水”，漆沮水即姬水无疑。

关于漆沮所在，历来有许多考证。《毛诗正义》云“属贡雍州云‘漆沮既从’，是漆、沮俱为水也。或言漆、沮为二水名。”

《汉书·地理志》云：“右扶风有漆县，云漆水在其县西，则漆是一水名，与沮别矣。”而汉末许慎之《说文》漆字云：“漆水出右扶风杜陵岐山，东入渭。”段玉裁注：“杜陵当作杜阳，杜阳今陕西凤翔府麟游县是其地。周公刘居豳，今陕西邠州是其地。汉之漆、柤邑二县也。太公迁邠，今凤翔府岐、扶风二县是其地。汉之杜阳南，美阳北也。《大雅》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传》曰‘漆，漆水；沮，沮水也。’又曰‘周原漆沮之间也。’《周颂·潜传》又曰‘漆、沮岐州之二水也。’据毛说则漆沮二水实为岐周之地。《小雅·吉日传》但云‘漆沮二水，麇鹿所生。’其解必同《大雅》、《周颂》。许云‘漆水出杜阳’，正岐周地也，……玉裁谓《水经》曰‘漆水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北入于渭’，正与《说文》合，惟‘岐’作‘俞’耳。酈氏引《开山图》曰‘岐山在杜阳北长安西，有渠谓之漆渠。漆渠合岐水与横水合，东注雍水，又合杜水，南注于渭’。郭璞《山海经》云‘今漆水出岐山’，皆与《水经》合”。以上段氏遍引有关漆山著作，详明周密。今人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第五章附录（10）中引《武功县志》云“古豳城在县南入里漆村东。”又云“县东门外有漆水，自豳岐之间东去。”豳即邠。颜注《地理志》以为豳、邠古音同。刘师培亦有相同意见。漆水在邠，而邠是姬周发祥地，则漆亦即姬，可无疑义。否则不可有漆水，亦无姬水。现谭其骥先生主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有漆沮水，发源于麟游县西偏之杜林，在今武功入渭，与过去说法相合。我们结合到徐旭生先生所云“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它与发祥陕西西部偏南的炎帝氏族居住地相距并不很远”的论断，而稍加改动：把黄帝氏族改为姬周，陕西北部改作西北部，就更合乎史实了。

我们所以要作这些改动，因为姬周虽然出自黄帝氏族，但